

## 特稿

本报记者 朱雅文 实习生 甘煜敏

今年9月9日,68岁的朱明终于走出这道封闭的铁门。

2006年,他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。因为吸毒,他卖掉自己在上海唯一的房产。出狱前,狱警联系朱明的家人无果,街道也表示无能为力。

朱明无处可去,身无分文。那一晚,朱明只能住在旅馆里。第二天傍晚,他被送到上海市宝山区一家洗衣厂门口。工厂靠近石洞口码头,隔着长江,对面就是崇明岛。

接待他的是比他大几岁的陈国胜。陈国胜先带他去吃饭,再去洗澡,最后替他买全所有生活用品。朱明在洗衣厂安了家。两个多月后再聊起来,他忍不住哽咽:“我没想到,陈老师对我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‘朱师傅,您饭吃过了没?’”

### 过渡的“驿站”

朱明到来的前一天,陈国胜一晚上没睡好。他是上海市虹口区社会帮教志愿者协会的金牌帮教老师,也是这家洗衣厂的办公室主任。他了解到,服刑时朱明因试图抢劫枪械,又被判了死刑缓期执行。“他内心有什么想法?身体状况如何?半夜会不会擅自离开?能不能适应工厂的生活?”但他还是决定接纳,“总要给他个出路的”。

在洗衣厂,和朱明一样的“三无”(无可回归、无可亲、无可就)刑释人员不止一人。吴强因犯盗窃罪入狱,2022年入狱时已59岁。举目无亲的他用8个字形容自己当时的处境,“衣食无着、居无定所”。他急需一份工作。经多方协调,他被安置在洗衣厂。和朱明一样,最初他也有过顾虑,司法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,洗衣厂安置刑释人员多年,十分靠谱。

考虑到吴强的年龄和身体情况,陈国胜安排他推货架车,是厂里较为轻松的工种。放满衣服后的货架车不好推,刚开始时,吴强干起来很费劲,他沮丧地找到陈国胜,陈国胜意识到,吴强想把工作做好,但内心十分焦虑。陈国胜安慰他,先定一个小目标,咬咬牙熬过一周是一周。就这样,吴强熬过今年上海炎热的夏天,如今已完全胜任。他意识到自己不是“没用的人”,“踏实,也充实。”吴强拥有了新生活。闲暇时间,他喜欢听歌,也会去工厂附近的小镇上唱卡拉OK。

工厂安置刑释人员已有20余年,对普通员工来说也不是新鲜事。朱明和吴强都曾担心厂里员工会对他们“另眼相看”。一位和朱明同住的员工表示:“他们都挺好的。”这位员工回家时,常把自己的电瓶车钥匙放在厂里,方便他们出行。

纪浩是上海市新航社区服务总站长宁工作站社工,有着近20年安置帮教经验。成立于2004年1月的上海市新航社区服务总站(简称“新航总站”),是全国首家从事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社会工作的社会服务机构。

纪浩发现,刑释人员入狱前可能存在一些社会和家庭方面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。出狱后,这些现实困境依然存在且一时难以化解,这成了他们焦虑和消极情绪产生的原因。他将刚出狱的刑释人员分为两类:第一类是在出狱后会第一时间向属地司法部门主动求助,安置帮教社工只需为其链接资源、助其生活步入正轨,但这样的人是少数;第二类占大多数,他们出于自卑和抵触心理,不会主动求助。

4年前,黄扬因袭警罪被判刑7个月。20多年前,黄扬与妻子离婚,净身出户。出狱时,黄扬61岁,身无分文。前妻和女儿拒绝接纳,他只能露宿街头。纪浩先帮助他解决了临时住处,恢复养老金的领取及申请廉租房。但这并不能彻底解决黄扬的困境。虽然前妻愿意提供材料帮助黄扬申请住房,但始终不愿与他见面。女儿如今有了自己的小家庭,也不愿坐过牢的父亲来打扰。

纪浩一直和黄扬保持联系,也常将他的生

# 当他们走出高墙



上海市帮教志愿者协会新航驿站设在仕操洗衣厂内的分站。

甘煜敏 摄

活情况告知家属。一方面让她们放心,另一方面也让她们知道,社工一直在帮助黄扬,他也有了明显转变。2年后,家属的“心门”终于被打开,主动将黄扬接回家。

洗衣厂只是刑释人员暂时过渡的“驿站”。在陈国胜接待过的刑释人员中,大部分人在适应社会后都有新去处,这是他希望看到的。当然也有人选择留下来。曾经的副厂长也是一名刑释人员,曾因犯盗窃罪“三进宫”,2000年左右,他来到洗衣厂,从最基础的洗涤工做起,一步步成为车间主任,最后成为副厂长,也在厂里收获了爱情。

每一个到厂里的刑释人员,陈国胜都喊他们“师傅”。在他看来,他们已为过去的事情付出了代价,他要做的是让他们重拾对未来生活的信心,“向前看,有盼头”。

### “受伤”的家庭

洗衣厂厂长陈仕荣72岁,厂里每来一名刑释人员,他都要和他们聊聊天。

到厂的第二天,朱明去陈仕荣办公室。他一走进去,陈仕荣立马从座位上站起来。一位比他年长的企业负责人起身迎接他,朱明觉得不可思议。“到了这里就安心,先把身体养好。”这是陈仕荣对他说的第一句话。

上世纪90年代,为解决返城知青、下岗工人的就业问题,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开办了荣伸洗衣工厂,属于政府部门的三产。当时,陈仕荣是街道经济科的干部,分管再就业工作。2005年,荣伸洗衣工厂改制为上海仕操洗涤有限公司,陈仕荣“下海”成为一名企业管理者。不变的是,他的洗衣厂依然在解决特殊人群的生活和就业问题。作为虹口区社会帮教志愿者协会会长,20年来,陈仕荣的洗衣厂先后安置了300多人次的刑释人员。

陈国胜2009年入职洗衣厂。他坦言,最初他内心也有顾虑,不理解这份工作,周围经常

有人说他“好人帮,帮坏人”。转机出现在一次春节慰问。那次,陈国胜跟着陈仕荣去探望一位服刑人员的孩子。小女孩只有10岁,她和瘫痪的母亲住在破旧的老房子里。除夕夜,小女孩的晚饭只有4个汤圆。那一刻,陈国胜意识到,他是在帮助一个“受伤”的家庭。多年的帮教工作也让他和陈仕荣意识到,犯罪行为的背后,“生病”的可能是整个家庭。

一次,陈仕荣接到狱警来电,对方称有一个罪犯自称是陈仕荣儿子,想要见他。陈仕荣吓了一跳,赶到监狱才发现,小伙曾在洗衣厂工作过,刚成年。他的母亲早逝,父亲再娶,从小无人看管,先后“七进宫”。第一次出狱到洗衣厂时,陈仕荣给他安排了工。

纪浩见过太多破碎的童年。章冲是他帮教过的刑释人员。20年前,他犯故意杀人罪,杀害的是自己的亲属。鉴于案件具有特殊动因,法院判其死缓,后依法减为有期徒刑20年。章冲出生不久,父母就去了甘肃,将他留给爷爷奶奶抚养。祖辈对他的管教方式唯有打骂,章冲从小没有“家”的概念,规则意识薄弱,最终走向歧途。

家庭是很多人放不下的牵挂。一名68岁的诈骗犯起初抗拒与陈国胜接触,但提到家里80多岁瘫痪的老母亲是他唯一的牵挂,他担心自己出狱后再也看不到母亲了,让陈国胜“想想办法”。从监狱回来后,陈国胜两次上门才遇到他的母亲。拍下照片,送进监狱,狱警说,男人一拿到照片眼泪就流下来了。

### 缩短的“空窗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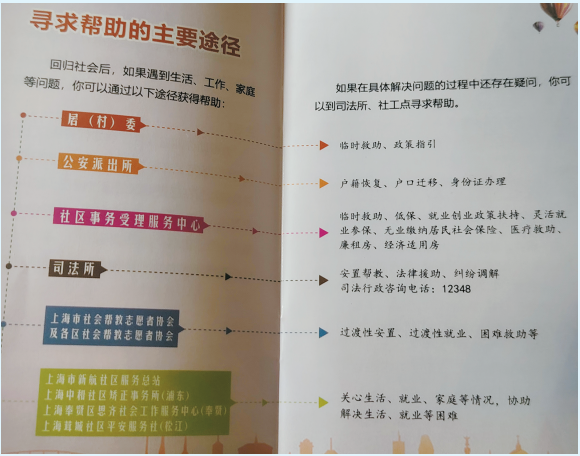
纪浩入监帮教过无数次。他既配合区司法局入监开展常态化工作,也作为新航总站“爱启新航”的项目骨干,为刑释人员提供专业帮教。

“爱启新航”项目的诞生,与上海出监监狱制度的探索几乎同步。2011年,上海市五角场监狱被定位为全国首批、上海市唯一一所出监



五角场监狱内的模拟实训场景。

资料图片



新航总站制作的“回归指南”。

资料图片

监狱,主要关押即将刑满或余刑在三个月以上、一年以下的短刑期罪犯。2013年监狱设立沪籍与外省籍出监监区,将上海籍刑释人员提前三个月集中,开展回归社会前的适应性训练。同年,新航总站与五角场监狱携手,在市司法局、监狱管理局和爱心帮教基金会的支持下,共同打造“爱启新航”回归教育项目。

自2013年7月起,社工每月入监,以“监社无缝衔接”为目标,多方协作,填补服刑人员出狱前“最后一公里”的教育空白,内容涵盖情绪管理与心理疏导,生活技能培训,法律与政策咨询等。

纪浩介绍,心理疏导是临释人员最为迫切的需求。他将服刑人员的心态分为三个阶段:刚入狱时,对环境感到陌生,会产生消极心理;随后慢慢适应;到了出狱前,焦虑和恐惧感就来了。心理疏导的目的,是了解最实际的生存需求。

黄蒙是纪浩帮教10年的对象。临释前两年,他得知自己户籍地的老房子动迁,前妻擅自代办了拆迁手续,随后哥哥又跳出来主张继承权。黄蒙与妻子离婚多年,孩子随妻子生活,出狱后他该住哪里?没钱又该如何生活?一系列未知的恐惧让黄蒙情绪失控。纪浩一边对他进行心理疏导,一边反复做其前妻的思想工作。多次协调后,前妻同意从动迁补偿款里拿出一部分给黄蒙。最终,在司法局与监狱的监督下,纪浩、动迁组、律师一同进监,黄蒙签署动迁协议,从此“吃下了定心丸”。

“向前走一步。”纪浩这样形容他的工作。当刑释人员还在服刑时,社工便定期入监,了解其家庭情况和出狱后可能面临的困境,尽量在出狱前有所解决,缩短他们出狱后的“空窗期”。在五角场监狱内有一栋模拟实训大楼,里面有社区事务受理中心、超市、银行、火车站等场景,目的是让服刑人员能在“仿真社会”里提前适应社会生活规则与流程。模拟实训大楼是“硬件”投入,“爱启新航”项目则是“软件”升级——监狱通过引入社会组织,解决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后就业、心理调适、社会融入等难题。

### 上海的帮教模式

安置帮教是一项系统工程,仅凭一方力量远远不够。

曾经,陈国胜帮教的一名虹口籍临释人员拒绝出狱。父母离异后,父亲将房产卖掉,与保姆结婚,导致他出狱后无家可归,而房产中有一部分是他的产权。陈国胜虽有心想相助,却难以精准对接街道资源、协调多方关系。他转而联系新航总站虹口分站的社工。凭借在各区扎根的网络优势,社工迅速联动街道、民警、律师及司法所干部,共同与其父亲协商。最终,家人将他接回,父亲承诺每月支付2000元生活费。如今,他被安顿在一个亲戚家中。

作为专业社工,纪浩主要帮助刑释人员应对心理调适与社会融入难题。而当遇到就业问题,他往往也需要借助上海市社会帮教志愿者协会的力量。

章冲出狱时已40多岁,家庭拒绝接纳。纪浩通过上海社会帮教志愿者协会联系到一家餐饮店。老板表示愿意接纳刑释人员。餐饮店包吃包住,章冲在店里备餐打杂,逐渐回归正常生活。

纪浩总结,新航总站和上海市社会帮教志愿者协会看似分工不同,实则在市司法局统筹下形成有机的整体,相互链接资源,合力为刑释人员排忧解难。

上海已形成“司法局统筹、社工主导、志愿者辅助、社会组织参与”的帮教模式。然而在就业层面,仅靠政府举办的专场招聘会仍显不足。这类招聘虽能在程序上淡化“犯罪记录”的影响,但企业参与才是关键。“像洗衣厂这样的爱心企业还是太少了。”虹口区社会帮教志愿者协会秘书长缪敏直言。多数企业最初因政策红利或资源倾斜而加入,发现“没有实质性好处”后便会退出。

缪敏也关注到,当下刑释人员中高学历、具备专业技能者占比显著提升,这对安置帮教工作提出了新要求。协会也与猎头公司合作,为他们匹配适合的就业岗位。

纪浩关注到胖东来今年8月公开招聘刑释人员一事,在他看来,这一举措不仅向社会传递了积极信号,也为其他企业提供借鉴。

### 没有终点的工作

郑波是新航总站总干事,亲历上海安置帮教体系多年发展。2016年,司法部、中央综治办、民政部、财政部联合制定印发《关于社会组织参与帮教刑满释放人员工作的意见》,标志着我国首次在国家层面系统化、制度化地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刑释人员帮教工作。

上海的探索更早。郑波介绍,2003年,上海便率先启动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建设,探索本地化社会工作模式,借鉴新加坡、中国香港及中国台湾等地经验,在全国首创“政府购买社工服务”机制。模式建立之初,专业社工从何而来?郑波说,一类是通过社会招聘,重点吸纳社会学、教育学、心理学、法学等专业背景人才;另一类“特殊力量”则来自公安与监狱系统的老干部,他们将30余年的执法经验转化为帮教技能。

上海的做法于2011年被纳入中央政法委《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》并在全国推广,为2019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》的立法提供了实践样本。

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张昱、费梅苹建议,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应转向专业的社会工作模式,摒弃传统的“管、监、控”,以平等、尊重、接纳的态度,提升服务对象自我管理能力的,并促进其与社会环境的良性融合。

一般来说,针对刑释人员的安置帮教期限为5年。今年11月,纪浩与黄蒙解除帮教关系。在此之前,他为黄蒙介绍了一份保安工作。如今,黄蒙生活稳定,临近退休。

在纪浩看来,这是一项没有终点的工作。他的手机里至今保存着不少帮教对象的联系方式。即便出狱多年,在生活中遇到问题,纪浩都是他们可靠的求助者。纪浩呼吁,社会对于刑释人员的限制应“因罪而异”,不能“一刀切”。要打破传统观念中“一朝犯罪,终身犯罪”的错误标签,建立可修复的犯罪记录制度。

(文中刑释人员均为化名)

解 放 日 报

连载广告

刊登内容

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 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 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 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 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

电话：021-22898598

“草原大会战”拉开序幕

考虑到221厂男女比例严重失衡,周总理有意识地从全国各地调来一大批中专、技校学历的女学生,进入221厂工作,从而帮助221厂的很多男职工找到了对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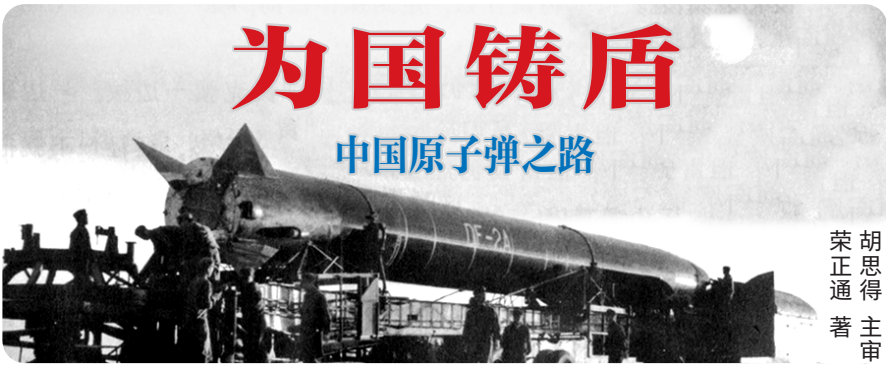
221厂的领导班子吃苦在前,享受在后,从不以权谋私,所以群众都很信服。三分厂有一个职工,因为家里有困难,隔几天就从三分厂到总厂找领导,当时是党委书记赵敬璞主管生产。有一天,那个职工一大早就去找赵书记,怕去晚了书记在开会,正巧赵书记也刚起床。他一进屋,就看见赵书记趴在痰盂上吐,吐出来的是带血的痰,同时又看到勤务员给赵书记送来了两个青裸面小馍和一碗青菜汤。那个职工顿时心里一惊:赵书记那么大岁数,身体又不好,还在这里坚持呢!赵敬璞看到他,问他有什么事,他就如实地说了自己家里的困难,看能不能把自己调回老家去。赵书记没有说别的,也没有讲大道理,就问他是干什么的,几级工。他回答说五级工。赵书记说:“我的困难是和你一样的,如果我要选择,我还是愿意回北京,不愿意在这儿待,但是不行,是事业需要啊,连我这样的都需要,你又是个五级工,事业就更需要你啊!咱们一起来渡难关吧!”从此以后,这个职工再也没去找过领导。

如果将草原的季节按气候特点划分的话,金银滩一年当中只有夏季与冬季:花儿开了——夏季,花儿落了——冬季。由于寒冷时间较长,每年取暖时间长达8个月。这种室外冰天雪地、室内温暖如春的工作、生活环境,使每个干部职工都有着“只争朝夕”的时间观。在221厂,家家户户几乎没有自己烧菜做饭的,全都在食堂就餐,厂区大小食堂都是三班倒,24小时服务。开饭时不少知识分子一边排队,一边看书,到了窗口还不知道买饭,闹出过很多笑话。草原人这种抢时间、挤时间、延长工作时间的自觉拼搏精神,使他们个个成为支配时间的主人,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原子弹的研制进度。

当历史的车轮驶入1963年下半年时,中国的核材料(铀矿、二氧化铀、四氟化铀、六氟化铀)供应已经基本不成问题,完成原子弹研制任务的关键在于如何研制出浓缩铀和核部件,以及爆轰试验如何获得足够多的中子。为了使理论工作更好地配合大型爆轰试验,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派出由胡思得等青年研究人员组成的工作组,随同试验人员前往现场参加试验并共同解决试验中遇到的理论问题。在王淦昌、陈能宽的具体指导下,核武器研究所实验部提前在1963年上半年开展了一系列缩小尺寸的局部聚合爆轰试验,取得了对爆轰规律较为完整的认识,同时带动了炸药加工工艺、试验部件装配及检验和各种测试技术的研究。

为了做到万无一失,王淦昌作为实验技术总管,连一颗螺丝的加工和一个焊点都要严格把关。他经常告诫做爆轰试验的技术人员:“雷管一定要保证质量,必须安装到位。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。如果有一个质量不好,或者有一个插不到位,波形就不好,最后就达不到理想的目的。”一种新研制的雷管在运输途中突然爆炸,相关技术人员找不到原因,心急如焚。王淦昌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 and 知识,迅速判断这是静电积累导致的,当即指示技术人员进行验证和实验,结果证明他的判断完全正确。

1963年8月,二机部部长刘杰赴221厂检查工作,决定把苏联来信信拒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的日期——1959年6月,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,即“596”,以此激励全体职工,坚决克服一切困难,按时研制出原子弹。向原子弹技术发起总攻的“草原大会战”由此拉开序幕。参加大会战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精神支撑着,那就是毛泽东主席提出的“一不怕苦,二不



胡思得 著 主编

怕死”。那时候,加班加点很平常,既没有加班费,也没有调休,还不需要干部做思想工作,每个人都无怨无悔。221厂科技部大楼晚上总是灯火通明,12点以前从不关灯。职工们经常半夜还回到图书室查资料,学习和工作的氛围特别浓。

1963年,221厂第一生产部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和生产工人开展技术攻关,刘杰亲自下车间鼓励技术人员和工人坚定信心,克服困。经过反复研究和试验,第一生产部终于突破技术难关,生产出合格产品。负责炸药件生产与加工的第二生产部不断改进生产工艺,为原子弹装置核爆炸试验和爆轰物理试验提供了合格的零部件。在全国大协作中,第三机械工业部(航空工业部)完成了原子弹装置中的大型金属部件制造任务。

因为当时生产条件非常简陋,原子弹的生产过程中存在很多危险,没有为国牺牲的精神是干不好的。221厂二分厂的201车间负责浇铸炸药,就是把固体的TNT和黑索金熔化成液体,再根据需要进行模具浇铸。炸药熔化时散发出来的气味特别浓,每天熏得人头晕、恶心,身体不好的人根本受不了。那时的工作量相当大,一天要浇铸几百斤炸药,一个炸药球就有好几百公斤。但是,为了能够早日造出产品,光浇铸炸药这道工序就必须做无数次试验,还要认真检查密度是不是达到了要求。201车间对温度条件要求很高,工作时窗户都是关闭的,还必须拉着窗帘,呈密闭状态,只有通气天窗用来流通空气。在这个车间工作的职工,大多数人都患了眼病(晶体混浊)和职业性肝病。上级领导关心201车间职工的身体健康,上级每月发给他们的保健费是全厂最高的,让他们购买白糖、茶叶和营养食品,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。

(三十二)

连载